

Newsletter of
International Liaison Committee for
Dunhuang Studies

主編/郝春文

2002—2005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
通訊集刊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 主辦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2005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

通訊集刊

Newsletter of
International Liaison Committee for
Dunhuang Studies

高田時雄 柴劍虹
策 劃

郝春文
主 編

周尚兵
助 編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主 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10. 上海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集刊/郝春文主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1
ISBN 7-5325-4242-4

I. 敦... II. 郝... III. 敦煌學-文集
IV. K870.6-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5) 第 113716 號

上海市重點學科建設項目資助
項目編號:T0404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集刊

郝春文 主編

世紀出版集團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啓東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24 插頁 4 字數 570,000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

ISBN 7-5325-4242-4

K·788 定價: 75.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公司管理部聯繫。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集刊

說 明

此書由《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第 1 至 4 期(2001—2004 年)集合而成。《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由高田時雄和柴劍虹先生策劃,由我任主編,主持編輯工作,其中第 2 至 4 期金澐坤協助進行編輯和校對工作,任這三期的副主編。集合爲此書時,採納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建議,對各期所收文章按其性質重新進行了編排,內容則基本未作改動。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自印行以來,得到了國內外學術界的支持和鼓勵。從 2006 年起,《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改爲每年一期,在每年六月左右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公開出版。其內容仍以刊載有關各國敦煌學的學術信息爲主,希望繼續得到學界同仁的支持。

郝春文

2005 年 9 月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幹事名單：

中 國 樊錦詩 郝春文 柴劍虹 鄭阿財(臺灣)

日 本 池田溫 高田時雄

法 國 戴 仁

英 國 吳芳思

俄羅斯 波波娃

美 國 梅維恒

德 國 茨 木

哈薩克斯坦 克拉拉·哈菲佐娃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網頁：

<http://www.zinbun.kyoto-u.ac.jp/~takata/ILCDS/proceedings.html>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秘書處地址：

日本國 京都市 左京區北白川東小倉町 47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高田時雄教授 Tel: 075—753—6993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KYOTO 606—8265, JAPAN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ILCDS)通訊集刊

目 錄

(2003—2005 年)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成立因由記	柴劍虹(1)
-----------------------	----------

學術綜述

2001 年敦煌學研究概述	王義康(2)
2002 年敦煌學研究概述	陳麗萍、江海雲(18)
2003 年敦煌學研究概述	陳麗萍(40)
2004 年敦煌學研究概述	陳麗萍(68)
2002—2003 年臺灣地區敦煌學研究綜述	鄭阿財(96)
2003—2004 年台灣地區敦煌學研究綜述	鄭阿財(102)
日本における過去一兩年の敦煌研究	高田時雄(108)
日本における最近 10 年間の古チベット語文獻研究	岩尾一史(111)
敦煌石窟藝術研究的拓展與深入	胡同慶(115)
敦煌淨土寺研究綜述	陳大為(118)
敦煌莫高窟第 275 窟研究綜述(一)	盧秀文(123)
海峽兩岸對回鶻佛教的研究及存在的問題	楊富學(130)
明海大學和敦煌學研究	荒見泰史(140)

會議介紹

跨越中國邊境的跨文化互動學術研討會	榮新江(142)
“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張小貴(147)
浙江省敦煌學研究會第六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紀要	張涌泉(151)
敦煌研究院將舉辦“2004 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	張培君(152)
中國唐史學會第九屆年會暨“唐宋社會變遷問題研究” 國際學術研討會即將在昆明召開	中國唐史學會秘書處(153)

中國唐史學會第九屆年會暨“唐宋社會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李 發(154)
“常書鴻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會”在杭州隆重舉行	許建平(161)
“醫學：從敦煌到中亞”學術研討會簡述	陳 明(162)
第 37 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側記	郝春文(166)
“社會與國家關係視野下的漢唐歷史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劉雅君(171)
2004 年美國宗教學會年會簡介	郝春文(180)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 2004 年臨時幹事會會議記錄	朱鳳玉(181)
IDP 第六次會議將在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舉行	林世田(182)
國際敦煌項目(IDP)第六次會議在國圖召開	林世田(183)
絲綢之路民族古文字與文化學術研討會召開	楊富學(185)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 2005 年擴大幹事會會議記錄	朱鳳玉(186)
聖彼得堡國際敦煌學研究座談會紀要	劉進寶(188)
特別展覽會「守屋コレクション寄贈 50 周年記念 ——古写經—聖なる文字の世界—」を終えて	赤尾榮慶(190)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創立 75 周年記念 ——中國宗教文獻研究國際シンポジウム景教・摩尼教セッション	高田時雄(194)

紀念文

在“常書鴻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	郝春文(199)
今天,我們怎樣守護敦煌?	柴劍虹(200)
狩野直喜與敦煌學研究發展	鄭阿財(204)
著名敦煌學、俗文學、滿學專家關德棟先生逝世	宇文卒(211)
著名敦煌學家張錫厚研究員逝世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212)

出版信息

《敦煌石窟全集》即將全部問世	張先堂(213)
《甘肅考古文化叢書·佛教藝術》出版	王義芝(215)
《浙江與敦煌學——常書鴻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文集》出版	許建平(216)
出版信息三則	王義芝(219)
出版獲獎信息七則	王義芝(221)

書評

《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1—3 卷)介紹	誠 遜(224)
《敦煌文獻合集》經部介紹	張涌泉(225)
《俄藏敦煌藝術品》第 6 冊介紹	府憲展(226)
三井文庫所藏敦煌寫本に關する近刊二點	辻正博(228)
The introduction of Divination et société 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	Jean - Pierre Drège(233)

心許天山 身獻高昌——讀馬雍《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感言	柴劍虹(235)
《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編輯後記	府憲展(237)
《中國石窟圖文志》評介	朱悅梅(240)
李小榮著《敦煌密教文獻論稿》述評	彭建兵(242)
敦煌學領域的新收穫——王啟濤著《中古及近代法制文書語言研究》 評介	汪 媛(245)
《西北出土文獻研究》創刊號介紹	關尾史郎(248)
《西北出土文獻研究》第2號介紹	關尾史郎(249)

論文

敦煌寫本相書概述	鄭炳林、王晶波(250)
サンクトペテルブルグ所藏敦煌文獻をめぐる問題と動向	關尾史郎(264)
魏晉“五胡”時代の鎮墓文からみた敦煌の地域的特質	關尾史郎(272)
羽田記念館所藏西域出土文獻写真資料中『鶯子賦』テキスト紹介	玄幸子(274)
讀《大周故沙州刺史李君墓誌銘》劄記	鄭炳林(277)
讀《李無虧墓誌銘》三題	李宗俊(288)
IDP 新進展:敦煌文字數據庫	高奕睿、林世田(293)

論著目錄

2002 年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	陳麗萍、江海雲(296)
2003 年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	陳麗萍(314)
2003 年日本における敦煌學の文獻目錄	高瀬奈津子(344)
2004 年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	陳麗萍(350)
稿約	(375)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成立因由記

柴劍虹(中華書局)

辛巳秋末,東瀛京都群賢畢至,少長咸集,追述“草創期之敦煌學”,以紀念先哲王國維、羅振玉東渡扶桑九十周年。余與郝君春文、榮君新江、方君廣錫、趙君和平應邀躬逢盛會。會間,東道主高田時雄教授倡議成立“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以加強敦煌學界同仁聯繫,承擔與協調國際合作項目。高田君乃京都敦煌學會掌門人,治敦煌學之語言通才,於今日學界之影響與日俱增,故與會者紛紛響應。然茲事頗大,沈默思慮者有之,畏難猶豫者亦有之。京都歸來,請示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季羨林老,答曰“稍待時機”。

越明年,盛夏時節,趁敦煌學史國際研討會於北京理工大學召開之機,高田君重提前議,回應之聲漸漲焉。余與學會副會長郝春文君等商議一二,遂再赴燕園聆聽季老之決斷。時季老雖患病體弱,仍關注此事,親自徵詢各方意見,權衡利弊,乃頷首許之,囑吾等附和高田君動議,且推敲具體方案,磋商落實首批幹事人選。高田君不辭勞苦,多方奔走,辛勤籌措,終於今歲三月八日在京都大學會館舉行“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成立盛典暨首屆幹事之會。日方幹事高田時雄主持議程,池田溫幹事與會指導;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首都師大教授郝春文、臺灣嘉義中正大學教授鄭阿財、中華書局編審柴劍虹為中方首批幹事出席。京都、東京、北海道等地敦煌學家亦聞風而動,牧田諦亮、上山大峻、礪波護、岡野誠、關尾史郎、石塚晴通等眾多俊彥攜手蒞臨,致賀賜教。時值仲春,草長鶯飛,雖乍暖還寒,櫻花未綻,而英才滿堂,高論齊放,實顯我敦煌學事業之繁榮昌盛、蒸蒸日上者也。惟惜法國戴仁、英國吳芳思二幹事,因要事纏身,未及與會。俄羅斯等國幹事人選,則尚待商定。

會議席間,委員及來賓紛紛陳辭獻策,計長議短,談鋒甚健,氣氛融洽。一致商定委員會之根本方針,系積極聯絡國際敦煌學界同人,努力開展重大項目合作,協調相關事務,推動學術進步。會間擬定委員會之英文名簡稱,IFILCDS,秘書處暫設於京都。又計議創建網頁、出版通訊、建設敦煌學知識庫、編輯敦煌學文獻資料庫與敦煌寫卷收藏地總目、籌辦紀念常書鴻、潘重規二前輩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等諸多事宜,皆切磋細膩,設想周全。議畢,國際佛教學大學院落合俊典教授致閉幕之辭,贊言會期雖短,成果頗豐,敦煌學之國際合作,可望喜開新篇,捷報頻傳也。

數月來,委員會秘書處運行有序。經高田君操持,會後僅六旬,網頁面世,遂使彈指按鍵之瞬間,信息播于四海。又經春文君親自催督各方,晝編夜集,使此通訊如期印行。效率之高,令人讚嘆。此刊付梓之前,主事者命余撰短文以敘委員會成立之緣由,遂不揣譾陋,為此因由記以告學界同道。余雖涉足敦煌學二十餘載,至今未能窺其堂奧,實不敢擔此重任。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其我之謂哉!癸未歲暮,記於中華書局漢學室。

2001 年敦煌學研究概述

王義康(中國國家博物館)

編者按:本刊之創刊號和 2004 年第一期分別刊載了 2002 年、2003 年敦煌學研究概述和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受到了學術界的歡迎。在本刊之前,曾有 1984 年創刊的《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研究通訊》連續刊載各年度的敦煌學研究概況和研究論著目錄。自 1993 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研究通訊》停刊以後,雖有《敦煌學輯刊》等雜誌有時刊載某年度的敦煌學研究概況和研究論著目錄,但未能連續。為能向敦煌學界提供一份連續完整的各年度敦煌學發展的學術參考資料,自本期起,本刊每年第二期分別刊載 2002 年以前各年度的敦煌學研究概述和論著目錄,一直追溯到《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研究通訊》停刊的年度為止;每年第一期則刊載上一年度的敦煌學研究概況和論著目錄。由於 2001 年年度的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敦煌學輯刊》已經發表過,所以,本期只有《2001 年敦煌學研究概述》,不再重複刊載該年度的敦煌學論著目錄。

本文介紹 2001 年中國大陸地區敦煌學的研究成果。凡港臺地區、國外學者在大陸出版的著作、刊登的論文也在本文收集範圍之內。據不完全統計,本年度大陸地區公開發表的有關敦煌研究論文 400 餘篇,論著 20 餘部,涵蓋歷史與地理、語言文學、社會與文化、考古與文物保護、宗教、藝術、少數民族歷史與語言等方面。本文雖然從各種期刊、索引及出版信息中收集相關的研究成果,力求完備,但限於篇幅,祇能對主要的研究成果概括敘述。

概 說

本年度敦煌學研究概括性論著主要涉及學術回顧與瞻望、文獻整理與研究、寫本辨偽、有關人事介紹與評價、文獻流散與收藏、文獻資料編目與信息管理等方面內容。

就敦煌學整體或某一領域的研究作出回顧,並進一步瞻望未來發展方向,有池田溫著、張銘心譯《近年日本的敦煌吐魯番研究》(《敦煌學輯刊》2001 年 1 期),從莫高窟等諸石窟及寺院遺址、墳墓等考古學、美術史;出土古文獻的語言學、古文字學、文獻學、文學、宗教學(佛教、道教、其他宗教);出土文獻的法制、社會經濟史;敦煌吐魯番地域史等四個方面回顧了近年日本的研究狀況,並對以後敦煌吐魯番研究提出新的期望。程喜霖《20 世紀敦煌文獻與古史研究》(郝春文主編《敦煌文獻論集》,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對 20 世紀敦煌文獻與古史研究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探討,認為敦煌文獻為王國維創立的“二重證據法”研究古史提供了重要依據,也為中古史研究開拓了新領域、提供了新材料。該文還對 20 世紀敦煌文獻與古史研究發展本身的階段性特點進行了回顧,認為自 1993 年以來進入低迷階段,並對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進行了探討,指出了推進 21 世紀敦煌史學發展應具有的五個方面因素。余欣《法國敦煌學的新進展——〈遠東亞洲叢刊〉“敦煌學新研”專號評介》(《敦煌學輯刊》2001 年 1 期)對法國遠東學院及《遠東亞洲研究紀要》做了介紹,並對有關敦煌學的論文做了點評。馬德《敦煌文獻對敦煌石窟研究的意義》(《敦煌文獻論集》)認為,敦煌石窟研究不能脫離敦煌文獻,石窟的研究應該在熟悉石窟

的基礎上，瞭解和掌握敦煌文獻的知識和內容，以便進一步做好石窟研究。王三慶《光道大師撰〈諸雜齋文〉下卷研究——兼論敦煌文獻之整理問題》（《敦煌文獻論集》）對 P. 3129 號文書下卷的作者、寫作年代、寫卷內容、史料價值，以及人物、官名、地名等進行了探討，並對敦煌文獻研究及整理文本也提出了看法。鄭阿財《敦煌童蒙讀物的分類與總說》（《敦煌文獻論集》）對童蒙讀物的分類、特質、蒙書整理與研究的意義、面臨的困惑等問題進行了討論，並對蒙書研究的前景作了展望。沙武田、邵惠莉《20 世紀敦煌白畫研究概述》（《敦煌研究》2001 年 1 期）對百年來敦煌白畫研究作了簡介，並加以扼要的評述。

本年度敦煌文書整理與研究方面的成就，首推郝春文著《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 1 卷（科學出版社，2001 年版），它是敦煌文書研究的階段性成果，該書將 S. 10——S. 323 號文書中的有關社會歷史方面的文書釋錄為通行的繁體字，並對原件加以校理，解決了文書中所涉及的大量定性、定名、定年等問題，並于每件文書釋文後附有校記和 90 年來學術界有關該文書的研究文獻索引，以適應當前敦煌學發展所需。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對 1990——1992 年甘肅省文物考古隊研究所在敦煌甜水井東南漢代懸泉遺址出土的漢簡中的精華部分進行了釋讀。這方面其他的研究有張俊民《〈敦煌懸泉漢簡釋文選〉校補》（《敦煌學輯刊》2001 年 1 期），對《敦煌懸泉漢簡釋文選》中錯訛之處進行了校正。李小榮《〈兄常勸弟奉修三寶，弟不敬信，兄得生天緣〉校注》（《敦煌研究》2001 年 2 期）主要對《兄常勸弟奉修三寶，弟不敬信，兄得生天緣》進行了校錄和注釋。魏迎春《讀俄藏敦煌文獻 Dx. 00098、Dx. 00513 號割記》（《敦煌學輯刊》2001 年 1 期）認為 Dx. 00098、Dx. 00513 號文書形式、內容與人們熟知的《太公家教》存在一些差別。陳國燦《遼寧省檔案館藏吐魯番文書考釋》（《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 18 輯，武漢大學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對遼寧省檔案館藏六件吐魯番文書重新作出錄文，在每條錄文之後又對內容加以考訂、解釋。對敦煌文獻整理的評論有張涌泉《敦煌故里對敦煌學的新奉獻——〈甘肅藏敦煌文獻〉讀後》（《敦煌研究》2001 年 1 期），該文高度評價了《甘肅藏敦煌文獻》編纂、整理的優點，同時也指出了存在的問題。楊森《從敦煌文獻看中國古代從左向右的書寫格式》（《敦煌研究》2001 年 2 期），則探討了古代文獻從左至右書寫格式大致發展的軌迹。

關於敦煌寫本的真偽，赤尾榮慶《關於偽寫本的存在問題》（《敦煌文獻論集》）一文，闡述了最近十五年來日本圍繞偽寫本研究的觀點，並對中國、日本存在的敦煌偽寫本提出看法，認為承認事實，將敦煌寫本研究跨學科地進行下去，這樣一種姿態是 21 世紀敦煌寫本研究的基礎。石塚晴通《敦煌寫本的問題點》（《敦煌文獻論集》）在日本學者偽寫本研究基礎上，從敦煌寫本的書寫工具及用紙的角度，就辨別敦煌寫本真偽的幾個問題談了自己的認識。落合俊典《羽田亨稿〈敦煌秘笈目錄〉簡介》（《敦煌文獻論集》）一文也涉及到了敦煌寫本真偽的討論。

敦煌學的發展是經過了幾代學人的努力，紀念或評價、介紹國內外著名敦煌學家及他們的研究成果的論著有：葉文玲著《敦煌守護神——常書鴻》（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年版）敘寫了敦煌藝術研究所的創始人——常書鴻的生平。王芃《1941 年王子雲率團考察敦煌石窟》（《敦煌研究》2001 年 1 期）對 1941——1943 年王子雲率團考察敦煌石窟的情況進行了介紹。楊麗梅、楊麗珍《外國人士中亞遊記簡析》（《敦煌學輯刊》2001 年 1 期）對國外學者中亞遊記的概況做了介紹。謝生保、趙崇民《第一個得到藏經洞文書的外國

人》(《敦煌研究》2001年1期)認為第一個得到文書的人是曾經給德國地理學家霍芬當過助手、並在中國做官的比利時人——保爾·施普靈蓋爾特。方廣錫《從‘敦煌學’的詞源談起》(《敦煌學輯刊》2001年2期)對何時、何人開始使用“敦煌學”一詞的問題作了補充說明。賀世哲《對張大千“不曾破壞敦煌壁畫”之質疑》(《敦煌研究》2001年1期)一文對這一“歷史懸案”進行了重新討論。

關於敦煌文獻流散、文物性質與收藏,榮新江《敦煌藏經洞文物的早期流散》(《敦煌文獻論集》),對1900年敦煌藏經洞開啓以後到1907年5月斯坦因進洞以前流散出來的敦煌絹畫和經卷進行了考察,探討了藏經洞文物初期流傳的情況。胡同慶《也談藏經洞文物的性質》(《社科縱橫》2001年2期)綜合目前學術界爭議頗大的“廢棄說”和“避難說”,認為藏經洞文物對當時人來說“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故封存處理。李際寧《中國國家圖書館近年入藏的敦煌遺書及其史料價值》(《敦煌文獻論集》)對新近入藏的19件敦煌遺書作了介紹。

關於敦煌文獻資料編目與信息資料數據化管理方面的探討,白化文《敦煌學原材料與研究書刊的圖書館編目問題》(《中國典籍與文化》2000年3期、《敦煌文獻論集》)從敦煌文獻與圖書編目的特色出發,探討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楊寶玉《英藏敦煌漢文文獻目錄述要》對50年代後出版的英藏敦煌漢文目錄,及新編成的《英藏漢文佛經以外敦煌文獻總目索引》作了評述。李鴻恩《敦煌研究院文獻信息資料數據化管理實踐與思考》(《敦煌研究》2001年4期)根據敦煌研究院資料管理中心文獻信息工作的特點,提出了網絡環境下自動化管理的總體規劃、完成目標以及實施辦法。

本年度敦煌學綜合論著有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該著內容涉及敦煌簡史,敦煌藏經洞的發現和物流散、研究的歷史,各種敦煌文獻及其價值的介紹,對敦煌石窟各方面的概說,敦煌寫本的外觀和辨偽問題,大體囊括了敦煌學的主要內容,而又突出了歷史學所關注的問題。相關論著尚有褚良才《敦煌學簡明教程》(中華書局,2001年版)。

宗 教

這一年度的敦煌宗教研究,涉及的宗教有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

在佛教方面,發表的論著涉及內容主要有文獻資料的刊佈、文書整理(包括譯經)、佛教法事儀式研究、佛教傳播及敦煌佛教研究的回顧與瞻望。方廣錫《影印敦煌遺書〈大乘無量壽經〉序》(《敦煌學輯刊》2001年1期)就私藏敦煌遺書《大乘無量壽經》擬將影印成冊的學術貢獻給予充分的肯定。他的《關於敦煌本〈壇經〉》(《敦煌文獻論集》)對現在知道的年代最早的禪宗經典抄本進行了研究。宗舜《〈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佛教文獻擬題考辨》(《敦煌研究》2001年1期)對《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大部分的佛教文書進行了辨識,擬定了題目,同時還糾正了個別擬題不確的情況。該氏《敦煌寫卷S.343V佛教文獻考》(《敦煌研究》2001年4期)將S.343背面的佛教文獻全部識別出來,糾正了《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擬目的一些訛誤。李刘《石谷風藏敦煌遺書殘卷內容小考》(《敦煌研究》2001年4期),對石谷風藏《下女夫詞》殘片作了識讀、校勘和介紹,並對10篇佛經殘片給以定名。黃征《王伯敏先生藏敦煌唐寫本〈四分律小抄一卷〉(擬)殘卷研究》(《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對失題敦煌唐寫本殘卷作了校錄、說明。霍旭初《唐代龜茲僧勿提提

犀魚漢譯《十力經》及其相關問題》(《敦煌研究》2001 年 3 期)以爲《十力經》是早期佛教宣說佛智慧力的經典。作者針對該經爲密教經典的說法經行了考辨,並對佛教文獻記載龜茲“滴溜成音”的傳說加以考證。王淑健《唐寫本〈抄十七地要〉考釋》(《敦煌研究》2001 年 3 期)以爲浙敦 072 號《抄十七地要》爲唐時人抄錄《瑜伽師地論》概要手稿。該寫本對研究吐蕃統治時期及張議潮歸義軍初年敦煌佛教狀況具有重要的價值。高田時雄《有關吐蕃期敦煌寫經事業的藏文資料》(《敦煌文獻論集》)利用有關寫經的藏文資料,探討了吐蕃時期敦煌寫經的實際情況。張鐵山《莫高窟北區 B53 窟出土回鶻文〈雜阿含經〉殘葉研究》(《敦煌研究》2001 年 2 期)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認爲該回鶻文殘葉的翻譯年代爲元代;回鶻文譯本《雜阿含經》至少有卷子式和貝葉式兩種版本;B53 窟出土回鶻文《雜阿含經》爲手稿本;該回鶻文譯本譯自漢文,而且是摘取漢文原文中部分詞句直譯而成。劉文鎖《尼雅浴佛會及浴佛齋禱文》(《敦煌研究》2001 年 3 期)對尼雅出土的佉盧文書中 511 號文書做了箋證,復原了當世浴佛儀式的若干內容,並與有關的浴佛經典、史籍及敦煌所出同類文書作了比勘。聖凱《論唐代的講經儀軌》(《敦煌學輯刊》2001 年 2 期)利用圓仁的記載及敦煌文書,討論了唐代講經法會的主要成員及其儀軌次第,尤其對“都講”進行了考察,提出佛教的都講並非來自儒家的都講制度,只是在翻譯時借用了這個名詞而已。譚蟬雪《喪祭與齋忌》(《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甘肅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利用敦煌文獻,就儒佛在喪葬、祭祀、禮儀的發展變化作了考察。楊富學、王占慶《從敦煌文獻看道信禪法》(《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對佛教中國化過程中禪宗四祖道信的作用進行了探討。王邦維《敦煌寫本中一段有關印度佛教部派的材料——S. 5390 號校錄並跋》(《敦煌文獻論集》)認爲,這一段有關佛教部派的材料,與可能是《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的文字抄在一起並不是偶然的,進一步證實了作者佛教的部派與律的傳承有關的一貫看法。湛如《論淨衆禪門與法照淨土思想的關聯——以大乘淨土贊爲中心》(《敦煌文獻論集》)對敦煌佛教信仰層面的顯著特點——禪淨合一進行了探討,認爲敦煌佛寺形態以禪律同住爲主,而義學在一定時期則有禪淨融合的傾向,而彌陀與彌勒信仰在敦煌並存現象,則表明敦煌淨土信仰的多元化。〔日〕上山大峻著、顧紅、劉永增譯《從敦煌出土寫本看敦煌佛教研究》(《敦煌研究》2001 年 4 期)以敦煌藏經洞出土的佛教文獻爲依據,指出敦煌藏經洞佛教文獻對中古佛教研究的意義;介紹了敦煌佛教文獻研究的現狀,以及敦煌佛教文獻對佛教研究的啓示,特別論述了吐蕃統治時期,敦煌佛教的獨立發展及其意義;同時還指出了目前研究的不足和今後研究的方向。楊富學《西域敦煌回鶻佛教文獻研究百年回顧》(《敦煌研究》2001 年 3 期)以爲西域、敦煌出土的爲數相當豐富的古代回鶻語佛教文獻,是古代回鶻佛教研究的第一手、也是最爲重要的資料,引起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重視,湧現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填補了西域佛教史研究的許多空白,回鶻佛教文獻的研究,是 20 世紀西域佛教史研究中成果最爲輝煌的領域。

在道教文獻整理研究方面,張澤洪《唐代〈道藏〉與敦煌道經》(《西南師範大學學報》2001 年 2 期)以敦煌道經寫本爲中心,探討了唐代《道藏》的編纂與道經的撰寫及經法傳授等問題,認爲在高宗時期唐代《道藏》已編纂成立。王卡《敦煌道經殘卷綴合與考訂三則》(《敦煌文獻論集》)將 DX. 2768 與 DX. 901 抄本綴合,又將 S. 9846 + P. 2390 號抄本綴合,確定其年代,對 S. 6241 殘本定名提出質疑。萬毅《敦煌本道教〈升玄內教經〉的文本順序》(《敦煌文獻論集》)對《升玄內教經》敦煌寫卷與有關佚文進行了討論,並對文本的

順序進行了排列。劉屹《〈內妙內篇〉考》對該道教經典在中古時期的演變作了探討。他的《敦煌本〈老子變化經〉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01 年 4 期)對已有的《變化經》成書時間成說提出質疑,認為《變化經》成書於南北朝末至隋代,而非漢代。關於道教科儀研究,王承文《古靈寶經與道教早期禮燈科儀和齋壇法式》(《敦煌研究》2001 年 3 期),探討了東晉末年古靈寶經中系統而完整的禮燈科儀和齋壇法式及其所體現的教義思想,並從南北朝到唐宋大量道教科儀書對該經的沿襲證明了古靈寶經對中古道教科儀發展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在景教、摩尼教、祆教等研究方面,顏廷亮《敦煌文化中的祆教、摩尼教、景教》(《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就三種宗教在敦煌流傳的大致經過、敦煌文獻中保存的相關經典與有關記載及學術研究情況進行了探討。林悟殊《高楠氏藏景教〈序聽迷詩所經〉真偽存疑》(中華書局《文史》2001 年 2 輯)認為高楠順次郎所藏恐非敦煌真迹。他的《20 世紀敦煌漢文摩尼教寫本研究述評》(《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對 20 世紀敦煌漢文摩尼教寫本的研究狀況作了詳細的介紹,並對我國 21 世界漢文摩尼教經典的研究作出樂觀的瞻望。樂睿《交河塔林與密教東漸》(《敦煌研究》2001 年 1 期)探討了古代西域密教發展狀況及對密教東漸的影響。

歷史與地理

利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唐五代歷史與地理,涉及歷史史實考辨,政治、軍事制度史,經濟史,歷史地理諸多方面。

鉤沉考稽政治史實方面。程喜霖《吐魯番文書所見唐安西都護府與絲綢之路》,針對研究西北重大歷史問題,如安西都護府只使用歷史典籍記載,結論失之偏頗,採用“二重證據法”把正史與吐魯番文書相互印證,揭示了安西都護府的全貌。王素《敦煌莫高窟創建時間補說》(《敦煌文獻論集》)反對將《李君莫高窟佛龕碑》中的“初秦建元二年”直接對應於前秦苻堅建元二年(366)的傳統說法,通過分析前涼的外交政策與境內人心的向北,以及前涼張氏統治者與敦煌高門大族,在奉用西晉還是東晉的年號問題上的分歧,並舉考古發現所出文書為旁證,敦煌地區私奉東晉康帝年號(344 年),至於初秦二字則是後人不明真相想當然加上去的。李正宇《索勛、張承奉更疊之際史實考》(《敦煌文獻論集》)對 P. 2569 號文書背面所載三首《兒郎偉》中關涉索勛下臺、張承奉上臺當年歲末,敦煌官府驅傩儀式的專用歌詞進行了分析,考察了歸義軍政權更疊之際敦煌諸政事。吳麗娛《關於 P. 2539v 書狀主人公的再辨證》(《民族史研究》2001 年第 2 輯)通過對書狀主人公的考證,提出“涇州太傅”一首的致書人是朔方節度使韓澄,從而揭示了後唐明宗之際靈武、涇州地方權力的轉移及五代朝廷經營問題。關於中晚唐大事記文書研究,盛朝輝《敦煌寫本 P. 2506、2810(a)、2810(b)、4073、2380 之研究》(《敦煌研究》2001 年 4 期)通過對五件文書錄文、研究,認為背面可以完全拼接,實為唐開元、貞元間的“大事記”,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

政治思想、政治、法律、軍事制度研究。陸離《敦煌本〈百行章〉所反映的唐初統治思想》(《敦煌研究》2001 年 2 期)主要結合史籍中有關貞觀年間唐太宗君臣論治的記載,探討了敦煌本《百行章》所反映的唐初統治思想。雷聞《俄藏敦煌 Dx. 06521 殘卷考釋》(《敦煌學輯刊》2001 年 1 期)對殘卷的內容、性質及擬名問題做了探討,認為俄藏 Dx.

06521 文書中包含著一道開元二十五年的《考課令》、一條同年的《戶部格》以及一條可能是開元二十八年的敕，其內容都是關於朝集制度的。初步斷定它可能是開元二十五年刪定律令格式同時編纂的《格式律令事類》之斷簡。由於該書散逸已久，長期以來被學術界忽視，但在中國古代法律史上有獨特的地位，它不僅是唐代律令格式體系向宋代敕令格式體系轉變的一個重要過渡，而且在體例上，開啓了宋代法典編纂形式的先河，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而本件敦煌文書的發現，為我們認識此書提供了極為寶貴的第一手材料。戴建國《唐“天寶律令式”說獻疑》（《法律史論集》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認為，唐天寶時僅制定過《天寶格》，沒有刊修過天寶律令式。P.2504號文書所存乃是天寶時期依據目前尚不能確知的文獻及當時的新規定所作的部分節錄。節錄者態度馬虎，其間的某些錯訛可能是此殘卷所據底本本身就存在問題，故不大可能是書於官司廳壁的律令格式的直接錄文。李方《西州諸縣及敦煌縣縣屬機構“司”（曹）探討》（《敦煌文獻論集》）指出西州諸縣及敦煌縣除設有傳世典籍與出土文書中明確記載的司法、司戶二曹外，還有司兵機構存在，這一點與典籍記載不合。該文還論述了縣尉分判諸司及縣諸司佐史的工作問題。該氏《唐西州政府機構的點檢制度與值班制度》（《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對西州地方檢點制度、上班制度，政府執掌點檢上值事務的部門和官員等問題進行了探討。馮培紅《敦煌文獻中的職官史料與唐五代藩鎮管制研究》（《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以唐五代藩鎮時期的敦煌職官史料為依據，結合唐制，闡述了敦煌文獻中職官史料對於唐五代藩鎮官職研究的價值。杜正乾《唐病坊表徵》（《敦煌研究》2001年1期）結合敦煌文獻對唐代病坊設置時間、職掌、淵源與佛教的關係等問題進行了探討。陳國燦《莫高窟北區第47窟新出唐告身文書研究》（《敦煌研究》2001年3期）將新出5件唐代告身文書中的4片綴合，復原成《唐景龍二年□文楚陪戎校尉告身》；另一片確定為《景龍年以後□文楚告身》。由此確定B47窟為唐□文楚瘞窟，二告身乃其附葬品。孟憲實《麴氏高昌追贈制度初探》（《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卷）鑒於史書記載對高昌官僚制度水平估計過低，探討了高昌的追贈制度，認為作為一種政治制度，高昌的追贈已經納入了官僚升遷銓選序列之中。高昌的追贈制度發揮著維護現存社會等級的功能。趙貞《歸義軍押衙兼職他官略考》（《敦煌研究》2001年2期）對歸義軍押衙兼職他官的史實進行了梳理。

經濟史研究涉及到土地制度與經營形式、契約、戶籍等方面。在土地制度與經營形式方面，馮培紅《唐五代敦煌的營田與營田使考》（《蘭州大學學報》2001年4期）一文，分唐代前期、吐蕃占領時期、歸義軍時期三個階段，對該地營田制度、營田使職官體系在各個歷史時期的演變發展，以及不同時期營田的性質進行了考述。張德芳《從懸泉漢簡看兩漢西域屯田及其意義》（《敦煌研究》2001年3期）利用新出土的懸泉漢簡，結合文獻考察了兩漢西域屯田，認為它不僅在當時發揮了重大作用，而且對後世有多方面的借鑒意義。楊際平《論唐末五代宋初敦煌地權的集中與分散》（《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對敦煌文書中相關資料進行了統計分析，認為唐末五代宋初敦煌地區的土地兼併形勢的確比以前嚴重，但大土地所有制並未占據絕對支配地位。朱雷《吐魯番出土唐“勘田簿”殘卷中所見西州推行“均田制”之初始》（《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8輯，武漢大學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仔細考察了數件“勘田簿”，推論其製作目的即為施行“均田制”做最為必要的前期準備。換言之，該“勘田簿”是唐平高昌後，為瞭解西州高昌縣民各戶實際占有土地狀況以推行均田制而作的。關於敦煌地區契約的研究，羅彤華《從便物曆論敦煌寺院的

放貸》(《敦煌文獻論集》)探討了敦煌便物曆的形式與性質、便物曆所反映的便物人與寺院放貸、借貸數量與寺院放貸、借貸利率與寺院放貸等問題。馬德《浙藏敦煌文獻〈子年金光明寺破曆〉考略》(《敦煌研究》2001年3期)以為浙敦116號文書記錄了五代時期金光明寺有關窟頭供養、修佛堂等項目的各種支出,提供了有關莫高窟赤安窟、工匠雇價等方面的新資料,以及敦煌金光明寺與莫高窟關係的新證據。陳國燦《莫高窟北區第47窟新出唐〈貸錢折糧還納帳〉的性質》(《敦煌研究》2001年4期)將莫高窟北區第47窟新出四件殘卷連為一體,推斷其為“貸錢折糧還納帳”,其書寫年代極可能在開元六年(718)至開元十六年(728)之間。楊森《〈辛巳年六月十六日社人於燈司倉貸粟曆〉文書之定年》(《敦煌學輯刊》2001年2期)認為曆書中“辛巳年”為“咸通二年”與情理相合。陳國燦《莫高窟北區新發現的兩件唐戶籍殘片》(《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對新發現的兩件殘片作了考察,確定B47窟所出戶籍為唐代早期戶籍,B49窟所出戶籍為大足元年(710)戶籍。

敦煌地區產業的研究涉及了農業、牧業、種植業、商業、手工業等方面。宋家鈺《敦煌文獻所見唐代農業生產》(《敦煌文獻論集》),根據敦煌文書推算唐代每戶農民大約平均實種四五十畝土地,作物結構也有較大的改變,麥的價值遠高於粟。作者還指出唐代畝產量大太超過前代,在北方土地較好地區達兩石左右,差的地區畝產量也在一石至一石半之間。乚小紅《唐五代敦煌牧羊業述論》(《敦煌研究》2001年1期)對敦煌地區牧羊業的經營形式、羊在社會生活中的用途、牧子向羊司納稅等問題做了探討。王艷明《從出土文書看中古時期吐魯番地區的蔬菜種植》(《敦煌研究》2001年2期)主要依據吐魯番出土文書,對中古時期吐魯番地區蔬菜種植規模、菜園屬性、蔬菜種類以及蔬菜加工、銷售等問題進行了討論。馮培紅《唐五代敦煌的酒行、酒戶和酒司》(《青海社會科學》2001年3期)認為,唐前期粟特人壟斷了敦煌的釀酒業及銷售市場,並組成了行業性機構酒行;吐蕃占領期間佛寺中首先出現了從事釀酒業特殊寺戶;歸義軍時期既在官府中設置酒司機構,又在寺院中繼續從事釀酒,有官酒戶與寺院酒戶之分。

關於歷史地理,研究論著涉及敦煌地理的沿革、交通、地志與地圖學發展等方面。李並成《漢唐冥水(籍端水)冥澤及其變遷考》(《敦煌研究》2001年2期)從實地考察並結合有關文獻,對冥水、冥澤的流向、位置及其歷史變遷狀況作了新的探討,指出《中國歷史地圖集》所標冥澤的位置不妥,冥澤應位於截山子南麓山前一帶的寬廣的湖泊沼澤地帶。他的《漢玉門關新考》(《敦煌文獻論集》)就玉門關址的變遷進行了探討,指出漢武帝元封四年始築的玉門關應是今嘉峪關市區西北約10公里處的石關峽。至太初二年或三、四年玉門關西遷至敦煌郡西北,其原址改置障城,名玉石障。五代宋初此處又重新設關,將玉門關返回到最早的關址石關峽,西夏占領整個河西走廊後,玉門關才從史籍中消失。候燦《魏晉西域長史治樓蘭實證》(《敦煌研究》2001年4期)利用考古文物、文獻,論證樓蘭城址即史書上所說的西域長史的治所。劉興義《漢晉表是縣和唐鎮陽城探原》(《敦煌學輯刊》2001年2期)綜合文獻資料與考古遺址,認為兩漢時期酒泉郡表是縣城即今明海子古城,光和中地震後縣城遂毀,又於今高臺縣駱駝城遺址上修建新縣城,同時還劃定了表是縣的四至範圍。關於唐鎮陽城,作者針對前人的成說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為創建的確切年代在581—583年間,隋代的玉門關在鎮陽城東,後魏瓜州晉昌郡與唐晉昌郡不是一地,鎮陽城不是官築的苦峪城。馬德《敦煌〈五臺山圖〉中的道路交通簡論》(《敦煌學與

中國史研究論集》)參照《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圓仁所記出入路線,進一步探討了敦煌壁畫《五臺山圖》中表現的交通路線與交通工具等問題。倉修良、陳仰光《從敦煌圖經殘卷看隋唐五代圖經的發展》(《文史》2001 年 2 輯)利用敦煌文書中的《沙州伊州地志》和《沙州都督府圖經》探討了隋唐時期圖經發展的狀況。王宗維《漢代絲綢之路的咽喉——河西路》(昆侖出版社,2001 年版)詳細介紹了漢政府開闢河西路的經過,以及保護和建設這個交通通道所採取的種種措施及取得的成就。該著下編又用相當的篇幅論述了絲綢之路上的重鎮敦煌。

古 籍

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對敦煌保存下來的古代典籍與唐代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張玉春《敦煌莫高窟藏〈史記〉唐寫本考》(《敦煌研究》2001 年 2 期)認為現存唐寫本《史記》,以原敦煌莫高窟所藏三卷殘本為最早,它反映了《史記》在唐代的寫本狀況,以此三卷殘本為依據,可以訂正宋代以後刻本的訛誤,並對探究《史記》原貌有重要作用。陸離《俄藏敦煌寫本〈春秋後語〉殘卷探識》(《文獻》2001 年 2 期)從俄藏敦煌文獻中新檢出四號《春秋後語》殘卷(Дх.02663、02724、05341、05784),考證其為 S. 713 的前半部分。張娜麗《敦煌本〈六字千文〉初探析疑》(《敦煌研究》2001 年 3 期)以為敦煌寫本《新合六字千字文》為世傳《千字文》本基礎上新增二字而成。該文還根據敦煌千字文注本及在日本流傳的千字文諸本,對新增二字的來源等問題作了考證,對邵惠莉所錄的《六字千文》(S. 5961)、《千字文》(S. 3835)本的誤錄、未錄部分作了校補。屈直敏《敦煌本〈兔園策府〉考辨》(《敦煌研究》2001 年 3 期)對《兔園策府》的作者、成書年代重新考訂,認為有可能是出自衆人之手,成文時間最晚不遲於貞觀十七年(643)。

社 會 與 文 化

因為敦煌文書自身的特點,社會與文化是敦煌研究的重要內容,本年度研究主要涉及科舉與社會、中古時期家族、基層社會組織、禮儀、衣食住行、風俗、體育等諸多方面。姜伯勤《敦煌科舉文書的社會功能——兼論敦煌寫本中的社會史料》(《中山大學學報》2001 年 3 期)將敦煌社會史料中有關科舉制的文書分為兩組,一組是直接記載了科舉制度及其風俗的史料,另一組是科舉教育史料或進士文學史料。認為敦煌所出的一切儒學經書實際上都是科舉教育用書,一些詩賦文章則是啓發士子準備科舉考試的進士文學,並以敦煌科舉制和禮儀文書史料的發掘為例,討論了根據文書在當時社會中的功能而拓寬史料範圍的問題。張國剛《唐代家庭與家族關係的一個考察——一份敦煌分家析產文書的學習札記》(張國剛主編《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三卷,中華書局,2001 年版)利用敦煌文書探討了唐時分家析產後的“同居共活”現象,認為中古時期的大家和小家具有一種似分似合、亦分亦合的特殊關係,其具體表現為兩者在經濟與社會生活上有密切聯繫。孟憲實《敦煌社邑的分佈》(《敦煌文獻論集》)對敦煌社會基層組織社邑的社會分佈和空間分佈進行了認真分析,指出在唐代後期到宋初這段時間里,敦煌的民間結社是普遍、成熟和有影響的。郝春文《〈敦煌社邑文書輯校〉補遺(三)》(《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01 年 4 期)則是對以前成果的進一步補充。

吳麗娛利用敦煌本書儀研究唐代社會禮儀發表了多篇論文。《從敦煌書儀的表箋狀